

散受六師之曰道之三三果也可目

刘心武 主编

焦静宜 著

神堯皇帝之
以風雨人
曰月而
周公箕
索玄珠
十步之奇
於衆封
太子少保
夏降綸
難懷悌
千委命
伐於商
拱二車
顏細必
我后豈庸
元六年正
入受爵

94224

遗老与遗少

主编 刘心武

副主编

张仲 张春生
王玉树 张凤珠

(京)新登字 173 号

遗老与遗少

焦静宜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100 千字

1994 年 4 月 第 1 版 1994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0 册

ISBN 7-80105-009-6/G·480 定价: 4.80 元

总 序

闲来无事，翻翻书总是好的。

如今市面上书可真多！我们这套，也来凑凑热闹。

这套书怎么样？作为主编，卖瓜夸瓜，想来读者朋友们也不会见怪。不过，我不想夸得离谱，只打算一是一、二是二地说说。

先说我为什么来主编这套书。有读者问：你这个刘心武，是不是就是写《班主任》的那个刘心武？还有《钟鼓楼》、《公共汽车咏叹调》、《风过耳》什么的——你不是写小说的吗？怎么又主编上这么一套书了？挂名儿的吧？

在下就是那个小说家刘心武，编这套书并非挂名。

我自己写书，也读别人写的书。在读书上，我大概是一个最普通的最有代表性的读者：过分专业化的、正儿八经的书，带着明确的目的读——不多，也不必多；完全没意义的、

JK41 / 13

仅仅供消遣消闲解闷驱乏的书，偶尔也翻翻，但翻完常常后悔——瞎耽误工夫！比较喜欢的、读得多的，是既有趣味性又有知识性的书，最好那趣味挺浓却又并不庸俗，那知识能深入浅出而且可靠，篇幅也别太大，看完了，高兴的时候还能跟家人朋友侃侃，那书买了，看完也还有保留的价值。

恰可好一拨文化界的朋友，写了这么一套书，他们推我当主编，我把书稿一看，满心欢喜，因为这些书就属于读起来既轻松，读完又能长真见识的那一类。每本书的作者，要么他本行就是研究那号问题的——是学有专长、有高级职称的民俗学家、社会学家，要么他就是潜心琢磨那学问的能人；他们写出的书，也许有的更精彩一些，也许有的选题更热门一些，如一个树林，每棵树的粗细姿态容有差异，但我保证绝无伪劣假劣之作，绝非从报刊和别人现成的书上用笔一抄用剪刀浆糊一较一贴的、“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制作（坦率地说，这类的书市面上不少），所以我不仅欣然应主编之命，也坦然向读者们推荐这套丛书。

这首先是一套关于中华文化的书。宽泛的文化概念，应包括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中华文化不仅存在于中国大陆，存在于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也存在于新加坡那样的国家，存在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因此这是一个大题目。我们将大题小作——选取了一个从社会风情切入的角度，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角度，纵览我们第一辑和第二辑的这十二本书的题目，相信读者可以洞见我们的苦心，我们不是因小见小，而是力图因小见大，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内行能见门道，外行也不仅仅是看热闹。此外，这套丛

书并不满足于罗列例子,或简单地撒一点理论的胡椒面,每一册篇幅虽不大,却都构成一个自我完满的潜在的理论系统,非专业性的读者不必去理会那理论系统,但那潜在的理论系统却有一种探秘的意味,这探秘的乐趣,我想读者一定乐于同作者编者同享。

掏钱买本书,不容易;我只盼买了我们这套书里无论哪本书的读者,至少能理解我们用心的良善,当然,我们更期待着读者朋友们的批评指正。

也许,在读者朋友们的呵护下,我们还可以推出第三辑、第四辑……是啊,煌煌中华,灿烂文化,斑斓风情,无尽内涵,携手探秘,其乐无穷,何不继续合作?

我们相约,在有一搭没一搭之间,在紧张生活的某些闲散间隙里——您说:好!——是吗?

谢谢。

刘 心 武

1994 年 1 月

于北京绿叶居

目 录

1	又留小辫又穿西装	1
2	从宣统皇帝到天津寓公	7
3	皇后恩怨	19
4	宫廷内外的“小德张”	28
5	水竹邨人徐世昌	37
6	状元实业家张謇	49
7	北洋之“虎”段祺瑞	60
8	辫帅张勋的复辟闹剧	68
9	高自标榜的吴佩孚	83
10	肃亲王府的女间谍	95
11	雪堂落水与观堂投湖	105
12	宦海沉浮的唐绍仪	115
13	“落花流水春去也”	129

又留小辫又穿西装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褂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足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这是1912年3月5日《时报》发表的一首歌谣。兴了吗？——兴了。灭了吗——灭了。

兴了吗？——没有全兴。灭了吗？——没有全灭。

20世纪的头三十年，像一面“哈哈镜”，把近代—现代大转变中的人物面影，都反映了出来。“哈哈镜”里的影象，是光学玻璃的曲折反射，而这一时期的一些特殊人物，都

有奇特的背景、变形的心态和不同的命运。

辛亥革命的风暴冲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使之在顷刻之间崩溃，社会也因之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皇帝大臣变为总统部长，翎顶褂服变为西装革履，世袭罔替变为国会选举，四方来朝变为地方割据，老爷小姐变为先生女士，子曰诗云变为声光化电，以至饮食起居无一不在变化。

真是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时代！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当历史刚刚迈进 20 世纪，中华大地还飘荡着被八国联军所制造的腥风血雨的余息，清王朝却在长期挨打之后又蒙上一层耻辱：它接受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其中一款是要四万万同胞各出白银一两来付所谓“赔款”。但是，炎黄子孙从来是以自己的鲜血和筋骨来祭祀祖先，他们勇敢地教训了侵略者，使这些虎狼熊豹从企图瓜分中国的迷梦中惊醒，感到这块肥肉并不能任人吞噬。那时，清政府的主持者是一位暴戾恣睢的老妪——慈禧太后。她虽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女皇”之一，但却不具备唐朝武后的政治睿智，而只发展了汉代吕后的凶残狠毒。她对内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旨来支配自己的行动；对外则因仓惶西行而心有余悸，便抱着“宁赠友帮，勿予家奴”的取媚态度。慈禧太后对内对外的种种倒行逆施，引发了人民群众各种形式的反抗，撼动着清王朝的基础而使它日趋衰朽，走向死亡的深渊。为了维持局面，在清王朝最后的几年里，曾忸怩作态地引进立宪政制、颁布宪法大纲、倡言改良政治等等，企图给人一种虚幻的向往民主的心理满足。可惜，事与愿违，广大民众没有受骗，仍然在各地掀

起各种形式的反抗浪潮——抗捐、抗税、抢米风潮、革命党起义……人们都以实际行动粉碎了伪立宪的骗局；上层士绅则借“立宪”这一资产阶级政治手段来谋求参政的阶梯，这些对延续两千年的封建体制都是一种打击和威胁。人们受到社会现实状况的影响，也在逐渐加深“不改变不得了”的心理意识。

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中有一部分冥顽不灵分子笃信奉天承运，天子圣明，妄想抱残守缺，坐等“中兴”局面的出现。一部分略有见识的士大夫，一方面见到社会动荡，大厦将倾，而谋求治平之道；另一方面却不愿冲破原有的平衡，要以小变求不变，希冀以点滴改良来延续政权微弱的生命，而把某些政治欺骗手段当作麻醉剂来解除心理上的不安。革命党人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英勇地前仆后继，以求现状的彻底改变，不断在东南沿海地区组织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政权。

社会上反应敏感的是多数知识分子，他们抱着救国救民的赤诚，采取病重急投医的态度，天真地向往东学、西学，向往西方文明，向往明治维新，探索救世良方。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是他们心灵上的镇静剂。由于日本地域邻近，风尚相习，所以有大批知识分子负笈东瀛，多方位的去求取治国救民的灵丹，所以 20 世纪初极一时之盛的“留日热”在某种意义上说含有爱国救国的重要内涵。当时一份名为《云南杂志》的革命刊物上有一篇文章大声疾呼道：“欲不使金碧山川黯然黯然，长淹没于腥风血雨之中；欲不使千余万文明神胄，如束如缚，呻吟于条顿、拉丁民族之下，是赖夫学，是赖夫游学。”这是当时留学救国的代表性舆论，这种心态变化对整个社会的求变思潮起着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后来，这一时期的留学生中绝大部分成为社

会求变的宣传者和实践者。

当时的求变心理和一些“革命”行为，虽然过于琐细和不尽符合现实，却显示出民国初年社会的一种新气象。社会风尚的种种改变确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去发辫，易服饰，改称谓和禁赌禁毒等等除旧布新的措施，不仅行之于共和国的命令文书之中，而且在逐步实行。这些政令措施触动了封建的秕政与陋习，也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移风易俗的快感。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民国初年的社会仍然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很多方面同封建传统相袭相承，因而她还不是崭新的社会，还只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这一过渡社会与辛亥革命前的过渡社会有所不同，其不同点在于前者希图改良旧有的封建内容，有所维新，以维护旧体制；而后者则力求引进一些西方和东方先进的政治制度，通过“洋化”而出现新的局面。

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年来封建体制的功绩是不可泯灭的。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封建的基土中所培育的毒菌，仍在侵蚀着新体制的肌体，各种不同体制与风尚的引进和改革都会随时被封建的旧势力所扭曲、利用。例如议会选举会受到军阀干预和人为的困扰胁迫，总统这个民主共和国的首脑会被军阀政客所玩弄与左右。更如皖系军阀组织安福俱乐部来操纵总统的选举，直系军阀悍然以金钱收买议员而制造了为曹锟贿选总统的丑闻。在任的总统黎元洪在不适合军阀需要时可以任由军警威逼，废黜出走，甚至遭到截车逼交印玺，更被诧为奇闻……这些行径都玷辱了民主共和国的历史，但终不能否认她在体制上的进步。

与此同时，民族经济确已有所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

界大战之际，它给中国民族经济以发展振兴的缝隙，如辛亥革命前的1903—1908年间，新工业公司注册者是265家，平均每年44家左右，而1912—1921年注册者竟增至794家，平均每年80家，几乎增加一倍。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棉、丝纺织染公司，1912—1914年间仅10家，而1914—1918年增至50家，增加了4倍，资本额也从321.5万元增至2523.1万元，增加了近7倍。但是，封建经济势力还是相当深厚，如军阀政客以其劫取攫夺所得大肆兼并土地，加强了封建经济的基础。许多民族企业吸收了军阀官僚资本，使他们成为企业的主要东家，给企业带入了封建霉菌，甚至还有买办，洋人也插足其间。政府的重要经济命脉——关税、盐税仍然掌握在洋人手中，当财政枯竭时还要乞怜于洋人，使民众产生了崇洋心理。

随着政治、经济的崇洋倾向，生活习惯参杂西式，以“洋”为荣的观念在更多人的思想中滋生发展。吃西餐、着西装、住洋楼、讲洋话成为时髦的行为，于是“器必洋式，食必西餐”，“外国细呢，西式新衣，列肆相望”，宴客不用西餐，“不足以示诚敬”，连旅店也多“一切器具均仿欧美式样”以招徕旅客。这些报纸上的报道反映了民初崇洋风气覆盖面之广。不过应该看到，这种崇洋心理还包含着对旧有封建社会生活方式的否定和追求新型消费途径的双重内涵意义，表现了辛亥革命后过渡社会的特点。

可惜，新的社会思想和风气由于缺乏一次雷厉风行的激荡而发展迟缓，因而给旧习俗以延续和抵抗的余地，其结果是在民国初年的“洋化”过程中，可以残存着全军保存发辫的“辫军”；可以在民主共和国的都城内保留着溥仪

小朝廷，并继续朝觐叩拜，跪请圣安；可以允许儒教徒大力提倡孔教，宣扬三从四德、节妇烈女；可以任凭复辟言论漫无限制地流传，并策划实行，等等。

正是由于辛亥革命没有彻底的大变动，所以民国初年的社会自然地形成一种中西杂陈、新旧并存的奇异景象。在这一过渡阶段的社会舞台上晃动着两大类引人注目的并变幻着政治色彩的人物：一类是辛亥革命后的胜朝臣民；一类是免起鹬落的北洋军阀政客。他们被民众目为遗老遗少，以各自不同的人生观点指导自己的行动，安排自己的生活，规定自己的命运。归纳起来不出这两大范畴。一种是识时务而顺应潮流的发展，弃旧图新；有的虽成为民国新贵，但昙花一现，不过是历史的过客；有的则历经宦海沧桑，投身社会事业，兴厂办矿，改变自己的轨迹，成为新事业的主宰；有的熙来攘往，争名夺利，时而失势，时而再起；有的力求摆脱旧的束缚，立异求新，忧国忧民，可惜壮志未酬，抱恨终身。另一种是逆潮流而动，抱残守缺：有的时刻不忘失去的天堂，以恢复祖业自励，以致齟齬事故，不惜扮演儿皇帝的丑角；有的自恃贵胄华族，顽抗民国，奔走呼号，甚至认贼作父；有的鸣锣响鼓，袍笏登场，重演前朝故事；有的自作多情，一死以报君主；有的遁迹林下，或皈依佛道，祈福来生，而终难逃天网；或托庇列强，寄人篱下，没没以终……

过渡性社会中的过渡人物浮沉在中国 20 世纪初的人海之中，这些 20 世纪初中国的遗老遗少，为后人留下了堪为玩味的雪泥鸿爪。选择他们的若干足痕，观察它的肌肤纹理，或作借鉴，或资谈柄，应当胜似听白发宫女的忆往谈旧吧！

2

从宣统皇帝到天津寓公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了 1911 年，皇帝没了。

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国君。他 3 岁登基，6 岁退位，是个名符其实的“小皇上”。溥仪退位经过了极大的周折，最初曾有以良弼为首的一帮遗老遗少，组织过“宗社党”，头上垂着小辫，竟然侈谈“革命”，无非为了保住皇族宗室的特权。但良弼因革命党一个炸弹而丧命，这帮遗老遗少也就树倒猢猻散了。

尽管帝王统治已经告终，但这位逊帝却依然享受着民国政府特定的“优待条件”，紫禁城俨然是国中之国，那些遗老遗少，民国显贵，仍然对他们三拜九叩大礼，俯首尊君称臣。中国民间有一句俗话，叫作“关起门来做皇上”盖出于此吧！逊帝的深宫生活一眨眼过了十二年。1924 年，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溥仪被驱逐出宫。他在天津做了七年寓公后，被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汉奸共同挟持他到长春，成为伪“满洲国”执政。溥仪认

贼作父，甘当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儿皇帝，是因为长期的逊帝生活使他怀念失去的天堂，而宫廷外复辟势力的围攻更使他难以自持，所以当日本帝国主义向他张开魔爪的时候，他欣然地坠入了罪恶的深渊。在这里展示一下他逊位后这一阶段的生活面貌，不难寻求到这位末代皇帝为什么甘当傀儡的答案。

紫禁城内的逊帝生活，主要是在溥仪的少年时代，如果说以前真正的帝王生活还能给他留下朦胧记忆的话，那么正是这段生活在他的头脑中打上了帝王思想的烙印。

辛亥革命后，溥仪“帝位虽逊，尊号犹存”。他在宫内仍使用着宣统年号，依旧是神圣的“天子”，接受朝拜，一成不变地实行着退位前清朝皇帝的一切制度和礼节。同时，他在紫禁城内，不仅照样保留着各部院的原班体制，而且还照样可以选幸妃嫔，诰封大臣。如1923年，溥仪先后任命宝熙（满族宗室）、荣源（溥仪岳父）为内务府大臣，后来感到他们并不是他理想的“能臣治吏”，便又命郑孝胥整顿内务府。郑长于察言观色，巧言善辩，尤其是他时时在溥仪身边进献复辟的诡计，很得主子的欢心，1924年3月，溥仪竟在一天之内连下了三道“上谕”：一赏郑孝胥紫禁城骑马，二加太子少保衔，三任总管内务府大臣。不久又命金梁允任内务府大臣。当然其他还有不少人被赏给内务府大臣的头衔。再如管理宫廷事务的机构，除了内务府之外，在宫内还设有四十八处太监，专门为皇室服务。如敬事房、奏事处、懋勤殿、南书房、四执库、尚乘轿、御茶房、御膳房、御药房、钦安殿、毓庆宫、做钟处等。以前宫内太监有三千多人，辛亥革命后遣散了一些，到这时还有八、九

百名。另外，在生活上，溥仪也没有多大改变，他每天照样按原来的排场进膳，为他一个人每顿饭要摆上几桌饭菜；他饮用的水，是每天要用专门的水车远从西郊的玉泉山运来，饮“玉泉水”这是从乾隆皇帝开始留下的旧例，直到溥仪退位后依然如此；他平时衣着十分讲究，每逢庆典祭祀，更要穿着皇帝服饰，动用全部銮驾。

溥仪在宫中不仅享受着各种旧有的荣华富贵，还随着各种新事物的传入开辟新的虚靡消费的途径，这个过去任何事情都要恪守祖训的“真龙天子”很快地引进很多新花样。他为了学骑自行车让人锯掉了碍事的门槛，建福宫遭火后他把废墟辟为打网球的球场；他听了来宫中教书的英国教师庄士敦送给他的外国音乐唱片，顿生学弹钢琴之念，于是叫人买来钢琴放在养心殿，还专请了音乐教师，开始还可以听到琴声叮咚，而且他还自己谱过歌曲（“腰横秋水雁翎刀”），但时间不长便被弃之一旁了；他看到外国画报上的绅士们牵着狗，便一下子养了一百多只，他最心爱的两条狗都是花重金从国外买来的，其中一只叫佛格的狗就是在柏林受过训练的黑色警犬，后来他到长春当伪“满洲国”皇帝的时候，还把佛格带在身边，寸步不离。

溥仪如此挥霍无度，是因为他自恃拥有清王朝数百年聚敛的数目惊人的大量财富，殊不知清末时已经缺乏管理，坐吃山空，财源匮乏。原来仅内务府所管的房地产，光契纸就堆满了官房租库的三间库房，多少年来没有人动它一动，后来有的被北洋政府接管，有的被盗卖，而仅留下的一部分也是有交租的就收下，不交租的从无人过问，有的甚至连内务府也弄不清土地、房产确在何处。实际的空虚

很快就成为表面的拮据，到后来连在宫中供职的官员们的薪俸也拖欠难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溥仪照样按清朝旧制举行了隆重豪华的大婚礼，为了把这次婚礼办得体面、风光，特成立了“大婚礼筹备处”，专门经办此事。1922年12月1日，紫禁城内旌旗招展，鼓乐喧天，紫禁城外迎亲所经街道都临时戒严，北京城内从外国使节到普通市民无人不知这次“盛举”。仅第三天的“受贺礼”，就在景运门外搭了两座大棚，棚内一百多张大圆桌摆满山珍海味，用来招待各路宾客；这次盛大的婚礼竟用去40万元，如果按当时面粉2元一袋的价格计算，可买20万袋面粉。这笔庞大的支度由何处筹措？终于有人献了一条妙计，就是用抵押的办法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那次用以抵押的东西大部分是咸丰、同治年间的金银器皿，当时一共装了四十多个大木箱还不够，又加上了两箱瓷器和玉器，这批珍贵文物抵押出去之后并未赎回，也就流落异国了。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样一个退位的逊帝，不仅满蒙王公、遗老旧臣把他当作顶礼膜拜的偶像，而且很多民国显贵也都将之奉若国宾，并且两者之间始终维持着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当时的北洋政府每年向溥仪提供400万元的经费，逢有传统节日、庆典，任上的大总统还要派人前去致意，溥仪如出宫门，还要派军警给予保护。当时溥仪为了寻欢作乐，买了一辆汽车来玩，他觉得在宫内开来开去实在乏味，想带领妻妾臣属等出城去颐和园浏览，北洋政府的军警机关为此事竟专派军警便随行保卫，一行二十余辆汽车浩浩荡荡地开出宫门，真可谓新式的舆乘，旧